弘扬伏羲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

编者按：

千百年来，伏羲始祖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源头之一。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考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研究伏羲文化，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报联合天水市委宣传部推出“弘扬伏羲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理论专版，进一步深化伏羲文化内涵阐释与价值挖掘，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

伏羲与儒家道统及其文明意蕴

韩星

中华文化为什么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文化具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统”存在。道统意识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精神纽带。

儒家的道统是以“六经”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孔子整理“六经”，教育弟子，也是对儒家道统的传承与构建。《周易·系辞下》提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脉相传的“五帝系统”，其中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周易·系辞上》还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的“圣人”就是伏羲。由于《周易·系辞》的权威性，对后来儒家道统谱系纳入伏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唐儒者的道统意识不如宋儒那么强烈，大都是沿着《周易·系辞》的理路构建儒家道统谱系。《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把古代典籍的形成追溯到伏羲。《礼记·月令》：“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礼记·曲礼》：“伏羲作琴瑟以为乐。”《礼记·乐记》：“伏羲乐名《立基》。”扬雄《解难》说：“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汉书·扬雄传》）扬雄阐明了伏羲作八卦、文王作爻辞、孔子作《易传》的过程及其意义。西汉经学家刘歆非常重视伏羲作八卦的历史作用与经典地位。《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易》曰：‘包牺氏王天下也。’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刘歆认为伏羲居于百王之先的地位。中唐韩愈也将伏羲纳入道统谱系。韩愈《原道》明确提出了尧舜以降道统的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但学者多忽视这段文字前面一段话，其中“为之工以赡其器用”出自《周易·系辞下》，是指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可见韩愈的道统观其实是以伏羲为起点的。

宋明儒者更明确地把伏羲作为开道统之先的圣人。关于道统谱系中的人物，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提出“作者七人”的观点：“作者七人，伏羲也，神农也，黄帝也，尧也，舜也，禹也，汤也。所谓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马者也……”《张子语录》中，张载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七位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帝王当作“作者”，即最初的创造者。朱熹《大学章句序》：“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朱熹纳伏羲入道统主要是以《周易·系辞下》为依据，在对前人易学成果集大成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周易本义》受邵雍影响，首载《易图》一节，包括《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图》九图，这九个图代表了易学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朱熹《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云：“恭惟道统，远自羲轩。”朱熹集中华文化道统之大成，为中华文明奠定了价值基础。理学家和心学家纳伏羲入道统谱系是一致的，只是对后来道统传承人物的列举有差异。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在《陆九渊集·取二三策而已矣》提到：“自羲皇以来，至于夫子，盖所谓有道之世，虽中更衰乱，而圣明代兴。”陆九渊认为伏羲以天地万物为师，始作八卦，创立道统，至孔子达到高峰。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没有对道统谱系进行系统性建构，但他还是有明确的道统观念，其心学建构与道统观念也有密切关系。他在《传习录》卷上《徐爱录》中说：“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王阳明概括了伏羲画八卦以来易学的演变。

以伏羲为首的道统谱系具有文明意蕴。古籍记载的有关伏羲氏传说事迹相当多：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取火种、造甲历、制嫁娶、创礼乐、设九部、制九针、立占筮等，与女娲共同创立并完善制嫁娶之礼、发明陶埙礼乐等，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工具、政治领域的典章制度、精神领域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中的婚丧嫁娶等文明创造的各个方面。这些说法显然并不是把伏羲看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许多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都记录在伏羲名下，实质上伏羲已经成为一个文明象征符号，代表了人类文明之初可能有的各种创造。儒家把道统谱系上溯到伏羲，拓展了道统的文明意蕴，表明道统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对道统的探源是对中华文明的探源的核心内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赓续中华文脉 推动创新发展

吴超

作为典型的中国本土学问，伏羲学研究的发展经验为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宝贵参照。通过对“伏羲”这类标志性文化符号的接续研究，中国学术在文明起源、哲学思维、价值理念等根本问题上，逐步构建起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解释框架。这种植根于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探索，正在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近代转型：西学东渐中的本土自觉

伏羲学的近代转型始于二十世纪初，与中国学术现代性追求及民族意识觉醒紧密相连。传统学术视域中的“伏羲”，长期笼罩于圣王史观与谶纬思想之下。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传入，促使中国学者以新视角重审伏羲传说，开启了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破天荒提出“截断众流”，将伏羲等一干传说人物排除在“信史”之外。这种“疑古”立场，虽然看似消解了伏羲的历史合法性，却为相关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倡导，也推动了人们对伏羲传说的理性审视，避免了盲目崇古的倾向。他与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伏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术领域。由此，伏羲学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并逐渐触及中华民族起源、文化认同等根本性问题。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剖析伏羲传说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历史学家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伏羲传说的变异，构建了传说流变的“文化圈”理论。民族学家凌纯声在湘西记录了苗瑶族群对“盘瓠”（伏羲类形象）的祭祀仪式和口传史诗。考古学家李济尝试将甲骨文符号与伏羲画卦传说相联系。此时的中国学人已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西方学术范式，力求建立基于中国材料的自主研究方法。闻一多所著《伏羲考》是近代伏羲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他运用比较神话学方法，系统剖析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与“兄妹婚配”传说，并揭示其与洪水神话的内在联系。他又通过广泛征引中外文献，指出伏羲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相似性，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后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学科建设：多元融合下的体系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伏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聚焦伏羲神话反映的原始社会形态与人类认知规律，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旨趣，为其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伏羲学迎来了全面繁荣。1988年，甘肃天水恢复公祭伏羲大典，标志着伏羲文化得到广泛认可。其后的学术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考古发现为伏羲学注入新活力。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蚌塑龙虎图案，被部分学者视为早期伏羲崇拜的印记；甘肃大地湾遗址为探索伏羲传说与渭河流域古文化的关联提供线索；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八角星纹饰，被解读为八卦的原始形态。考古材料虽不能直接证实伏羲其人，却为理解其传说生成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关键参照。二是跨学科研究成为新时期显著特征。哲学界深挖八卦蕴含的朴素辩证法与宇宙观；天文学者探索“仰观天文”传统与八卦起源的关联；数学史专家关注“作算数”传说与中国古代数学源流；医学界从“制九针”记载溯源针灸疗法。这种交叉融合不仅丰富了伏羲学内涵，更加彰显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思维。三是地方性文化研究兴起。西南少数民族的伏羲类神话（如苗族“姜央”、彝族“支格阿龙”）得到系统整理，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社区的伏羲文化传播进入研究视野，凸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凝聚力；天水师范学院伏羲文化产业研究院、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等一大批机构的成立，为学科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外，国际汉学界对伏羲文化兴趣日增。欧美、日韩学者从比较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贡献见解；中国学者也日渐活跃于世界神话学大会、国际易学研讨会等平台。双向交流既促进了伏羲学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全球传播。

当代使命：对文明根脉的赓续创新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视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当代伏羲学研究面临三大转向：一是从纯学术考据转向价值挖掘，注重阐发伏羲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谐观念、实践品格等当代价值；二是从分散研究转向系统建构，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伏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从书斋研究转向社会实践，促进学术成果向文化传承、社会教育转化。从方法论来看，伏羲学研究已形成文献考据、考古实证、田野调查与跨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路径，体现了中国学术注重整体与辩证思维的特色。有别于西方神话研究的分析性取向，中国学者更关注伏羲传说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科技传统的有机联系。从知识体系来看，伏羲学已整合神话学、考古学、哲学、天文学等多学科智慧，构建起以伏羲文化为核心、辐射中华文明诸多领域的阐释系统：从八卦到《周易》的哲学演进，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的知识传承，从原始信仰到伦理体系的文化积淀。这种基于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有机整合，为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了密钥。

面向未来，伏羲学研究须在四个方面持续深化：一要加强基础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跨学科解读；二要推进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三要完善学科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四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民间文化传播。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将伏羲学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使其更好地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独特而深厚的文明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大地湾遗址与伏羲神话的文明特质互证

何晓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在大地湾遗址与伏羲文化的互证研究中得到深刻诠释，两者通过“考古实证—文献叙事—文化地理”三维框架，构建起理解中华文明特质的双重解码路径。

连续性与伏羲文化的时空互证

大地湾遗址历史跨度从距今8000年至4800年，完整展现了中华文明从原始聚落到早期国家的演进历程。这一无断裂的文化链条，与伏羲传说所反映的文明进程高度契合，为探索伏羲文化的物质载体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文化内涵上，大地湾考古发现与伏羲创世传说形成多维度对应：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系统与伏羲“始作八卦”的记载相互印证；聚落层级分化的考古实证，反映了伏羲“设九部”的社会治理雏形。特别是距今5000年的F901大型建筑所体现的“前堂后室”格局，与《周易》“圣人易之以宫室”的记载形成时空呼应。从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到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符号，再到《周易》哲学体系，伏羲文化构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发展脉络。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而且通过天水伏羲庙的世代祭祀得以活态传承。大地湾遗址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节点，既见证了中华文明“累进式生长”的内在逻辑，也为理解伏羲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提供了关键坐标。

创新性与创世传说的双向驱动

伏羲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其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等开创性贡献与大地湾先民的技术创新形成双向驱动，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特质。在农业领域，大地湾先民驯化黍粟，驯化率达92%，发明骨耜农具，构建储粮窖穴，储量可达5吨，实现从采集到生产的转型，印证伏羲“教民佃渔”传说，碳化标本基因测序更显示粟作驯化与传说时序高度吻合。建筑技术上，F901大型建筑以中轴对称、料礓石混凝土地面和陶制排水系统，体现“象天法地”空间观，成为伏羲“立九部”治理体系的空间具象。符号系统方面，彩陶刻画符号与甲骨文形态关联，为“伏羲画卦”提供物证；鱼纹向人面纹的演变及漩涡纹与星象组合，实现自然崇拜到哲学抽象的升华。这种技术实践与神话叙事的互证，凸显中华文明“因地制宜”的创新基因。

统一性与治理原型的早期实践

大地湾遗址的聚落形态与伏羲治理传说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实践。距今5500年至4900年的四期聚落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形成中心聚落—次级聚落—普通村落的三级结构，祭坛T806出土256件祭器、中心储粮量为边缘17倍等考古发现，则通过宗教仪式、资源调控实现文化整合，实证了伏羲“设官分职”的制度雏形。F901大型建筑出土的鼎罐钵固定配伍及彩陶鼓、玉琮礼器组合，反映了“器以藏礼”传统的形成。治理能力上，储粮可达5吨的储粮区H398、年产陶器1200件的陶窑群F405等功能分区以及350米环壕与陶制排水管网等水利工程需每日5000人协作，这一规模体现跨氏族动员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雏形。这种“多元一体”的整合模式，为中华文明统一性提供了史前模板。

包容性与文明互鉴的史前范式

大地湾遗址作为史前文明互鉴的典范，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态。在农作物体系上，遗址出土的阳坡山玉料、东部沿海海贝及7500年前的小麦遗存，揭示了陇山东西向的原始贸易网络。艺术风格上，大地湾彩陶纹饰融合了马家窑文化的漩涡纹、中原仰韶文化的鱼纹及本土几何纹，其“垂弧纹”装饰带与中亚安诺文化陶器存在形式呼应，猪龙玉雕则与红山文化形态关联，形成“彩陶互动网络”和“玉器交换体系”，彰显史前艺术“和而不同”的杂交创新。技术传播方面，玉器线切割技术与辽西兴隆洼文化同源，陶窑结构演变受中原裴李岗文化影响，共同勾勒出史前“彩陶之路”的技术传播网络。这种“农作物—艺术—技术”三维互鉴模式，与伏羲“调和八方之风”的传说形成跨时空对话，实证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即具备开放包容的特质。

和平性与生态智慧的原始基因

大地湾遗址展现了中华文明和平性与生态智慧的原始基因，其长达3000年的文化层中未见城墙等防御设施，形成直径300公里的“土木建筑技术共享圈”，印证了伏羲“造干戈以饰武”的防御性思想，与两河流域征服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技术驱动的发展模式尤为突出：H398储粮窖穴可储存5吨黍粟满足500人全年需求，F405陶窑群通过分室结构实现年产陶器1200至1500件，黑曜石贸易网络覆盖数百公里，开创了“修文德以来之”的治理传统。生态智慧方面，鹿角日晷的24道刻度融合农时与天象观测，F411地画“鱼—鸟”纹饰构成早期阴阳观念表达，与伏羲“仰观俯察”的宇宙观共同塑造“天人合一”价值内核。这种“技术—制度—生态”三位一体的和平演进逻辑，构建了“和合共生”的文明范式。

大地湾遗址与伏羲文化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考古实证与神话叙事的深度互证，不仅还原了先民在黄土高原生态适应中的生存智慧，还将其升华为“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文明哲学。

作者单位：平凉市委政策研究室

以伏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孙宏旺 张建军

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由伏羲文化奠基的中华文明及其精神财富，一直滋养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礼仪，发明生产工具、结网罟、兴渔猎，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伏羲部落的龙图腾更是融合了其他部落的图腾特点，象征符号蕴含丰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合”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伏羲文化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要大力传承伏羲文化，弘扬开拓创新、团结进取、自强不息、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始祖起源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初情感记忆，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原初意识，对民族成员具有不可替代的心理感召力和情感认同力。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等为代表的神话传说之中，有中华民族起源的群体记忆，印证了中华民族同宗同源。“三皇五帝”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在战国时期。一般认为，三皇指燧人、伏羲和神农，或指天皇、地皇和人皇，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伏羲被看作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早于炎帝神农氏和黄帝的始祖，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钥匙，对中华文化当中天人合一、和合大同、阴阳转化等思想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体系和人文观念。今天，在中华大地上，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被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共同祭拜。全体中华儿女对伏羲的崇敬和礼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不竭源泉，也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伏羲文化所代表的创造精神、和合精神以及包容气度，是联系全球华夏儿女的文化纽带和精神基因。

伏羲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工具不断发明和更新的历史。伏羲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包括农耕、渔猎等远古时期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早期文明，还包括天文地理、结绳计算、祭祀、建筑、制器等。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伏羲发明原始渔猎工具，帮助原始先民们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推动了中华先民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在大地湾遗址中，结网制绳工具的出土，让伏羲发明生产工具、“结网罟”“兴渔猎”等众多贡献得到了印证。语言文字是一个文明的重要标识，伏羲造书契、创文字，奠定了中华民族古文字的基础。伏羲打破了群居生活的蒙昧状态，改革婚制，制定嫁娶之礼。传说中，伏羲女娲兄妹为了建立原始部落时期人类生存秩序，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结束了当时的群婚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初的家庭制度。伏羲还为人们定姓氏，有效地区分了先民部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不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我们要树立宽广深远的历史视野，以伏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超越“想象的共同体”的桎梏，要在“有形”上用心、“有感”上用情、“有效”上用力，在“有形”上打造文化符号、“有感”上实现情感相通、“有效”上强化“五个认同”，借助有形的文化符号实现具象化、感知化，使民族成员能够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系统，实现从文化符号到情感相通的升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是一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坚持“大一统”的追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由多元走向一体。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华民族以“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自称，“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上古时期，华夏先民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有学者把伏羲描述为龙身人头，认为伏羲是有巨大力量的雷神和世间妇女结合所生的有着神奇力量的“神人”。闻一多认为，龙图腾的形成过程，是以大蛇为图腾崇拜的伏羲部落，在自身崛起和壮大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其他部族多种形式的图腾，然后有取舍地吸收到自己部落的图腾当中。伏羲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面纱遮盖下的龙图腾，充分彰显了史前时期中华先民们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龙图腾是以伏羲部族为主体，融合和吸收众多部族的图腾特点而形成的一个新图腾，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与包容性，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